



阳明先生致良知的一生

□ 胡森森

中国传统观念推崇知行合一，人生即学问，学问即人生，学问的背后连接着独特的人生经历与体验。这一点上，王阳明同儒家至圣先师孔子格外相似。孔子一生沉浮起落，既有执掌国事，诛杀少正卯的风光，更有厄于陈蔡绝食断粮的痛苦。孔子以降的儒家诸贤中，王阳明的一生经历最为波澜壮阔、起伏跌宕，从进谏下狱，龙场悟道，再到远征戡乱，平定叛贼，经历别人未曾经历之事，自然开出不同凡响的哲学之花。王阳明以哲学家入世，文韬武略，教化传世，“左手不释卷，右手不离剑”，事功同哲理交相辉映，实现了知与行、文与武的统一。阳明心学以知行合一开启，终于“致良知”命题，既来自于讲学论道，更来自于实践履行。特别是两次平乱和一次平叛的军事行动，闪烁着王学的精神：“某于此‘良知’之说，从百死千难中得来。”

坎坷的经历

王阳明早年上书为弹劾刘瑾的御史辩护，触怒刘瑾，遭廷杖之刑发配贵州龙场，中途还被刘瑾派来的刺客劫持，佯装跳河自尽最后逃走，经海路自浙江漂泊到福建，九死一生。他一生文治武功，建立盖世功勋，而这背后隐忍的痛苦，也非常人所能领会。

正德十四年六月，王阳明奉朝廷之命前往福建，防止宁王朱宸濠起兵谋反，官船行至赣江顺流而下抵达丰城县，却传来了朱宸濠已经谋反的消息。朱宸濠坐拥十万大军，围攻安庆城，朝廷的救兵迟迟未到。万分危急之中，王阳明集众义勇，行围魏救赵之法，急攻巧战，只用35天时间活捉朱宸濠，迅速平定南昌，抚慰军民，休养生息，并将朱宸濠等俘虜登记造册遣送京师。但前方将士浴血奋战，后方佞臣玩弄权奸。在朱宸濠已经被俘之际，兵部却仍召开会议研究征剿方略，武宗朱厚照下诏“亲帅六师，奉天征讨，不必命将”，自封朱寿大将军，率领一万余人浩浩荡荡出师南征。行至良乡地区时，王阳明的《擒宸宸濠捷音疏》送达，但武宗坚持御驾亲征，要求王阳明将朱宸濠重新放回鄱阳

湖，由他自己来江南重新打一仗，保证圣驾“亲征擒获”。幸臣张忠、许泰等人先期到达南昌，已经开始纵兵抢掠，污蔑普通百姓为贼，随意杀戮献功，一场大捷演变成一场危局。

如此好大喜功，视战争如儿戏、人命如草芥之事，王阳明自然坚决反对。遵旨纵放，可保全头颅和乌纱，但将士牺牲就会白费，江西百姓也将再遭兵灾涂炭。一己富贵生死与百姓身家性命，孰轻孰重，阳明心中自然有良知权衡。他最终决定冒抗旨之罪，与皇帝及身边的群小周旋。于是，王阳明屡次上疏劝阻，称将亲自押解朱宸濠赴京献俘，武宗不听，并屡次催促王阳明停止献俘，等候御驾。张忠、许泰更是出于邀功之私心，公然对王阳明大肆诬陷。王阳明冒死上书力谏，又委曲求全改写战报，将功劳归于佞臣，方避免了一场兵祸，却又因此被构陷通敌。学生冀元亨被押送至京师锦衣狱，下狱枉死，自己也差点再遭牢狱之灾。

超越的人格

王阳明功高盖世却遭遇不公，被诸多阁老首辅等官场老油条排挤，未能得到重用，又被批为“狂狷”，不为朱子学派的主流所容，最后抱病出征广西，于戎马之际病逝，未能享得高寿。然而他一生光明磊落，不假外物，不为乡愿，只是尽心尽意求得心安，弥留之际笑说：“此心光明，亦复何言！”此等人生经历、人格抱负，是中国儒家士大夫修齐治平的典范。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在王阳明身上完美统一。

王阳明以入仕实践心学，怀持着教化一方的施政理想，诠释了中国人对于政治责任的独特理解。他到地方就任出行，打的牌子不是戏文里常见的“肃静”“回避”，而是“求通民情”“愿闻己过”。他创“十字牌法”、保甲法、乡约法，不仅防盜，更在于鼓励崇德向善，恢复古已有之的家族互助精神，强化乡里凝聚力。他用“谕俗”四条教育民众：“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不要因一言之忿、铢两之利轻易构讼，贻害子孙。他认为官员有责任教化乡里、爱惜民众，凡是落草为寇的地区，必然是因为“有司抚养之有缺，训迪之无力”，要追究教化不力

的责任。在《告谕浈头巢贼》中，对聚众落草的盗贼首领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剖析理解其落草的苦衷，逐条分析其为寇的利害，并坦陈自己在“杀与不杀”之间的艰难权衡，以“真心”打动贼首望风而降。平定盗贼后，毫不居功自傲，而是反思不足，在《与杨仕德薛尚谦书》中提出“破山中贼易，灭心中贼难”，表达自己移风易俗、教化人心的政治理想。

与王阳明相比，清末的曾国藩虽被誉为“古今第一完人”，但历史上争议颇多。王阳明以圣人之志入军务，不以功业为意，只求此心光明。曾国藩以翰林身份筹办乡勇，用事报效君王之心更胜，办事之凶悍有余，其谋划算计老成持重，却少了很多质朴赤诚。曾国藩对于民众的感情仅及家族闾里，其余则诛杀殆尽。杭州城为李秀成太平军所破，秩序井然，复为湘军攻破，十室九空；李秀成厚葬浙江巡抚，湘军则残杀太平军将领。一将功成万骨枯，白骨露野人相食，中国历史上很多功业往往囿于本土意识和功利算计，用百姓之血染红官帽，走不出成王败寇和血酬定律。同样参与镇压农民起义，王阳明不仅恩威并施，以德行感化避免武力，更能够将心比心体谅农民或不满或被挟持造反的苦衷，皆因为心中有大慈悲、大智慧。

1524年中秋之夜，52岁的王阳明设席宴请门人于天泉桥碧霞池上。月光如洗，池水清碧。酒至半酣，歌声渐起，诸弟子操琴吹竹，投壶击鼓而歌，王阳明乘兴作《月夜二首》。其中一首是：“万里中秋月正晴，四山云雾忽然生。须臾浊雾随风散，依旧青天此月明。肯信良知原不昧，从他外物岂能撓。老夫今夜狂歌发，化作钧天满太清。”此诗道尽了王阳明此生的甘苦，他对朱熹、郑玄等大儒的批评和更正，不为世人所容，一生背着狂狷的骂名，承受奸小的谗言。但他所主张的狂，是快意恩仇、个性充沛的狂，是狂歌五柳、诗书江湖的狂，凭借此心光明，而在外界纷扰复杂的变迁中，保持自己的良知。当程朱理学走向晚期，士子以博闻强识为能，以读书渐进为进阶之门时，王阳明却开出了顿悟的药方，主张以此心之光明照亮世界，消弭尧舜与凡人的界限。此种耿介刚直的精神，对于任何时代颓败庸碌的朝野，都不啻一剂猛药。

通达的学说

王阳明的知行合一不是知识与实践的机械对应，而是意念与行动的自然融合。但凡意念之动，必然指向外物，但凡外物之情，则必然与我有关。譬如山中花朵，“此花为我而开”，不是否认物质世界运行，而是睁眼之后看到此花，花开对我方有意义。这种思维可谓与西方现象学等现代哲学超时空相通。王阳明的哲学有情怀、有温度，他主张“万物一体之仁”，世间事只有对人而言才是有意义的，不存在脱离了人的意义。他一生经历坎坷磨难，除了完善和坚定了他的信念之外，更完成了知行合一的人格塑造，求仁得仁，无怨无悔。

王阳明不主张在书斋中省察克己，而是在与外界的接触中，在实际的事业中悟得人生大道，回归良知。人不能与外部世界隔绝，而应尽心尽意做好包括科举功业、柴米油盐在内的一切，在做任何事情的时候都要精一、用心，尽力而为但不执著结果，不为功利目的所屏蔽。这种主张无疑充满了人生的自由灵动与舞蹈的精神，显得分外鲜活。王阳明的四句教“无善无恶心之体，有善有恶意之动，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代表了儒家哲学在心灵层面的最高成就，通过对心的呵护与珍惜，完成儒家的最后一块拼图，中华道统、政统、学统于此浑然一体。

阳明学说简易真切，并能身体力行，故能经久传承。王阳明的人格魅力与其学说高度融合，为官与从政的高度统一，使他远远超越了一般意义上忠君报国的清官循吏，而成为有理想、有担当的政治家化身，学说与人生交相辉映，故能源远流长。时至今日，浙江、江西、贵州、广西等地都不乏香火祠堂，并留有不少轶事传说，阳明学在日本等东亚地区的影响力也要超过朱子学。究其原因，心学之“心”，抓住了古往今来人的共性，无论高官显贵还是平民凡夫，都离不开“心”的问题，所有宗教和具有宗教色彩的哲学，其最终的影响也要透过“心”来实现。

人物志

清代中俄恰克图贸易兴衰之鉴

□ 狄鸿旭

中俄之间的贸易源远流长，特别是清代以降，中俄贸易成为中国北方陆路贸易的主流。在中俄贸易中，主要商品有皮毛、茶叶、大黄、丝绸、瓷器等，随着17世纪茶叶逐渐成为俄国民众极为重要的日常饮品，茶叶在中俄贸易中越来越重要。此后，中国东南区域所生产的茶叶，从福建武夷山、湖南安化、湖北羊楼洞等地，途经鄱阳湖、汉口，河南赊旗镇、洛阳，穿越太行山，过太原、雁门关，出杀虎口、张家口，北上归化（今呼和浩特）、库伦（今蒙古乌兰巴托），直抵恰克图，开创了联通莫斯科和欧洲的“万里茶路”。这一连接东南中国与内陆亚洲，并达至欧洲的商路，造就了辉煌的“晋商”，催生了一批草原丝路名城，深刻影响和改变了当时中俄两国区域的民众生活，并在一定意义上推动了沿路国家的现代转型。

恰克图贸易的兴起

依托“万里茶路”所发展的商业城市中，“恰克图（布里亚特语：Хяггта，原属中国）”的位置尤为重要，其兴衰变迁也颇耐人寻味。恰克图位于色楞格河东岸，南距库伦约400公里，清初属喀尔喀蒙古土谢图汗中左翼末旗辖内。康熙初年，大漠深处的恰克图，只是稍有聚落的草原小镇。1727年（雍正五年），中俄签订《恰克图条约》，规定允许俄商在两国交界处进行零星贸易，此后，恰克图逐渐成为中俄贸易的“据点”。

互市之初，贸易之处仅有零星商人，规模有限。后来中俄分别在恰克图建立固定市场“买卖城”，并派兵遣官，对集市进行管理。随着1756年俄罗斯停止传统商队进京贸易，中俄商贸的重心转向边贸，恰克图地位日趋重要。在商贸往来的推动下，昔日小镇很快发展成为“菊海以南，燕然以北，广袤数千里，商贸皆萃于此”的“朔漠之间一都会”。

据俄国学者统计，1755—1760年五年间，恰克图的中俄商贸总额由837000卢布

增加到1358000卢布，至1781年，商贸总额增至7470622卢布（〔俄〕柯尔萨克：《俄中通商历史统计概览》，俄文版，第73—74页），这使得同期俄海关税收因恰克图贸易的繁荣也增收3倍。

在恰克图贸易蓬勃发展时期，由于中俄之间的各种矛盾纠纷，导致清朝曾先后三次闭关停止恰克图商贸。1792年，在对前期商业活动严格规范的基础上，中俄签订《恰克图市约》，重开恰克图买卖城，此后恰克图商贸进入黄金发展期。

恰克图贸易的衰落

1851年，中俄订立《伊型、塔尔巴哈台通商章程》，通过该章程，西北地区开辟了伊型和塔城两个市场，俄商在恰克图与中国通商的贸易格局被改变。此后，俄国通过不平等的《中俄天津条约》《中俄北京条约》，又取得了中国的海路贸易权和内陆商业特权，茶叶贸易的巨额利润使俄国茶商作为殖民势力深入到中国内地，在产茶区直接建厂制茶，进行贸易。在俄商直接采茶，沿江沿海经天津运输获利的时候，曾盛极一时的晋商在茶叶转运中，不但要在天津缴纳关税和厘金，而且在天津至买卖城的各个内地关卡都要缴纳一定的税金，在不等条约的庇护下，中国商人难与俄商匹敌，坐失其利，造成恰克图有行无市。1863年以前恰克图约有100山西行庄，到1868年仅存4个。恰克图贸易无可挽回地衰落了。

对今天的启示

当前，我国正在倡导“一带一路”建设，回望百年前以恰克图为标志的中俄传统商路兴衰，有几个值得借鉴和思考的因素。

一是条约规范是商业活动的基础要素。在西方视野中，即便是明清时的中华帝国晚期，与周边国家关系的基础仍然是“朝贡制度”体系，建立在西方资本主义文明基础上的条约体系，恰是与“朝贡制度”不同的现代商业规则。然而，在恰克

图商贸中，清朝并未将俄纳入朝贡体系中。作为重要双边关系的中俄关系最初主导形态就奠定在条约模式的基础上，《厄布楚条约》《恰克图市约》等早期的平等条约的订立，为商业繁荣奠定了基础。1762-1792年恰克图曾三度闭关，其原因恰如乾隆所指出的：“近几年俄罗斯等屡背原定条款，纳我通逃，于我界内立棚，向伊等商人增加税收，以高价扰害我商人。”违反条约约定，是贸易中断的主要原因。在重开恰克图之后，条约规范推动中俄商贸蓬勃发展，直至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不平等条约的签订，以及由此导致的商业贸易失衡，最终使恰克图商贸衰落，中俄平等的双边贸易也走向终结。

二是和平环境是商贸各方获益的根本保证。恰克图商贸的繁荣，主因在于清朝平定了准噶尔部，帝国内陆的蒙古各部成为中俄贸易的重要枢纽及组成部分，区域和平为商业繁荣创造重要条件。蒙古各部作为清朝的地方代表，与晋商一道，共同参与到中俄贸易的过程中。与此同时，由于欧陆陷入拿破仑战争，失去和平环境，通往欧洲的海路受限，部分商业要素转移到陆地通道，又进一步推动了恰克图陆路商贸的繁荣。而恰克图商贸之衰，主因则是国内爆发太平天国农民战争。起初晋商虽能将茶叶产地自福建转至湖北等地，但是因战争而产生的厘金重税，为晋商套上了沉重的商业枷锁，并影响到商业发展走向。

三是商业贸易是文化交流和人民交往的重要方式。作为语言不通、风俗相异的两个国家，中俄间的早期交往，主要依赖于处在中间区域的蒙古人。在外交层面，蒙古文一度作为官方文字行用，在商业活动中，蒙古王公贵族等也参与其中。在以晋商为主的“旅蒙商”群体中，更流传着“一条舌头吃穿刚够，两条舌头挣钱有数，三条舌头挣钱无数”的谚语，三条舌头意味着能讲汉、蒙、俄三种语言。因商贸发展出的语言习得现象，正是文化交流的生动写照。

中蒙俄商贸之路催生了张家口、归化城、库伦、恰克图等一批商业城市，形成了边地城市中蒙汉杂居的交流交融。晋商

群体在贸易过程中，充分注意融入蒙地和俄商的风俗中，如遇有藏传佛教寺庙的法事活动，商人也踊跃捐款，参与其中。以茶叶为主的商品输出，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内陆亚洲各民族和俄罗斯人的生活方式，俄罗斯近代经济学家瓦西里·帕尔申在《外贝加尔边区纪行》中写道：“涅尔琴斯克（尼布楚）的所有居民，不论贫富、年长或年幼都嗜饮砖茶……早晨就面包喝茶，当早餐，不喝茶就不上工。午饭后必须有茶。”

如今，中俄贸易的茶叶之路沿途留下的珍贵历史遗物又成为商贸往来文化遗产的构成。这段辉煌贸易的过往记忆，成为周边国家友谊和平、共享未来，推动中俄在商业、贸易、文化诸方面发展的象征性资源。

四是商业贸易在推动产业转型中的作用值得关注。19世纪初的恰克图商贸，在中俄贸易板块中具有重要位置。在早期恰克图商贸中，中国的大宗出口产品为手工业织作的棉布，俄国为粗加工的毛皮。然而，在贸易深化过程中，俄国逐步实现了由原料产品“毛皮”到工业制品“毛呢”的升级，而中国无论是贸易前期的主要产品“土布”，还是后来居上的主要产品“茶叶”，都是生产技术简单和附加值低的原料产品。这一商贸发展过程带动了俄国国内的产品结构升级，而中国所出口的商品，尽管获利颇丰，但并没有带动国内原料生产的升级转型发展。同时，因需求拉动而在山地丘陵广泛种植的茶树，对环境生态也造成不良影响。

如今，现代化的浪潮席卷全球，民族国家间的商业贸易形态逐步变化，但是，基于国家主权独立和平等契约精神框架下的商业贸易仍是国家间商业活动的主要形式。新时期“一带一路”背景下，中蒙俄贸易走廊建设具有重要意义，在此过程中，相关国家都应抓住有利时机，利用当前和平和公平的商业环境，推动本国产业的转型升级，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美好未来。

史镜

由战国入秦汉，列国纷争渐熄，大一统格局初现，中国由此别开一路，影响垂于两千年后。

统一国家肇始于秦，却未能稳固，而汉代加以承继，持续完备，在技术层面上较好地解决了中央集权的诸多课题，由此造就了相对成熟、通润、柔化的运作体系，开创了长期稳定的政治期。

作为政权构建、运转的核心机制之一，选人用人制度关系权柄操持、政由所出，进而牵涉国本根基、国运盛衰，当属“顶层设计”中最为紧要的关节之一。汉代治国有成，与其发展出一套行之有效的选官制度关联匪浅，而察举制即为其大端，不仅与两汉四百年相始终，其韵味更及于后世，至今犹有余音。

与帝王公卿由上而下征辟士人不同，察举之途，为自下而上的推选人才，由人主择贤用能。此法古已有之，且广为施行。入汉之后，建制趋密，功效益彰，蔚成大观。察举制在汉代之流变，是一渐趋整密、日形完备、终成方轨，为一代所遵的制度化过程。

汉高祖刘邦称帝不久，即于十一年（公元前196年）下诏：“贤士大夫有肯从我游者，吾能尊显之。”这当是汉代察举的滥觞。惠帝、高后时，都曾诏举“孝弟力田”，使其为民表率。文帝二年（公元前178年）、十五年（公元前165年）分别诏举“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者”。至武帝时，国家走出初创期，诸事精进，察举也与世相协，成为一种较为完备的选官制度。

汉代察举标准，为“四科取士”，《后汉书·百官志》注引应劭《汉官仪》说：“一曰德行高妙，志节清白；二曰学通行修，经中博士；三曰明达法令，足以决疑，能按章覆问，问中御史；四曰刚毅多略，遭事不惑，明足以决，才任三辅令。皆有孝弟廉公之行。”

标准虽虽仅四则，察举科目却很多，主要为孝廉、茂才、贤良方正、文学、明经、明法、尤异、治剧、兵法、阴阳异等，体现了选才的开放与多元，然究其要义，实为“公、能、智、勇”四字。

虽无明诏示下，但诸多察举科目实则分为岁举和特举两类：岁举为常科，即郡国每年都要向朝廷举荐人才，如孝廉、茂才、察廉、光禄四行等；特举则由诏令临时规定，如贤良方正、文学、明经、治剧等，尤以前两类为常见。现将主要科目略述于下。

孝廉。孝廉即孝子廉吏，始于武帝元光元年（公元前134年）诏令：“初令郡国举孝廉各一人。”可见举孝、察廉本为二目，亦非常科，但在后来往往并称，且为岁举，成为有汉一代最为重要的察举科目，被视之为“正途”“清流”。起初举孝廉以郡国为单位，名额相同，但因各郡国人口悬殊，实则并不公平。东汉和帝永元年间，改以人口为标准：率二十万人岁举孝廉一人；不满二十万，二岁一人；不满十万，三岁一人。后又对边郡少数民族杂居地区适当放宽。就被举者来看，多为州郡属吏或通达经学的儒生，而任用多从中央的郎署或地方的令、长、丞起步，升迁较速，前程远大。汉代名公巨卿，多有出身孝廉者，此科政治影响之大，可见一斑。

汉代察举制之梗概

茂才。西汉曰秀才，东汉时为避光武帝刘秀讳改为茂才（茂材）。元封五年（公元前106年），武帝下诏：“其令州郡察吏民有茂才异等，可为将相及使绝国者。”为此科之始。其后，宣帝、元帝时均有察举茂材异等的诏令。此科至东汉建武十二年（公元36年）成为岁举，与孝廉同为两汉最重要的科目。因茂才为州举，孝廉为郡举，因此前者数目远较后者为少，且被举者多为现任官吏，因而其任职也较孝廉为高。

贤良方正。文帝二年，下诏：“乃十一月晦，日有食之。三公执政，举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者，以匡朕之不逮。”始开此科目。其后两汉诸帝多颁布过此类诏令。当时人以为灾异关乎人世，是上天对于帝王的谴告，因而诏举贤良方正，多在天降异象之后，在表明“罪己”之外，也显示“纳天下言”、匡正过失的姿态。

文学。文学即经学，多与“贤良”连称。文帝十五年（公元前165年）诏举贤良文学，晃错即由此科入仕。而察举文学正式见于皇帝诏令，则始于昭帝始元五年（公元前82年）：“其令三辅、大常举贤良文学各二人，郡国文学高第各一人。”文学一科在汉代很受重视，名人辈出。

其他科目，如明经、明法、尤异、治剧、勇猛知兵法、阴阳异等，所举条件不一而足，在此不一一分述。

作为较为完备的选官制度，察举并非孤立而行，而是多与考试相辅相用，以求得人。无论是郡国岁举的孝廉，还是诏令特举的贤良、文学，到朝廷后，均须考试。考试的内容，依《后汉书·左雄传》：“诸生试家法，文吏课策奏”，以经学、章奏为主。考试方法，则有对策和射策，前者为命题作答，后者即抽签考试。考问主体，则上至皇帝亲策，下至公府甄核，几乎遍及察举的各个科目。

以考试接续察举，压缩了养贤空间，令制度更趋严密。考试制度本身经过不断完善充实，至隋唐发展为“科举制”，绵延1300余年，对中国影响至深至远。

中外制度史